

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性

殷企平

内容摘要：我们如今倡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是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那么，外国文学研究又能怎样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呢？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家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了对策。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我们来说，必须重视文学艺术才能抵达的情感结构，即流动中的社会体验，否则很可能重蹈西式现代化的覆辙。那么，情感结构/社会体验怎样才能转化为知识呢？以笔者愚见，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重视文学艺术为我们带来的共情，二是要着眼于隐喻系统的构建。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共情；隐喻系统

作者简介：殷企平，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The Relev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we advo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s to serve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what way, then, c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serve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 great many outstanding literati have brought queries, along with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various problems. This affords us lessons that merit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us, who endeavour to realiz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 set great store by art and literature so as to reach for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namely the fluid social experience, otherwise we may find ourselves stranded on the same old disastrous road taken by Western countries. How can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the fluid social experience, then, be transformed into knowledge? There are at least two ways in which we can get there: first, 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ensus communis brought forth by art and literature; second, by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metaphors.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sensus communis; system of metaphors

Author: Yin Qip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qipyin@hotmail.com

DOI:10.19915/j.cnki.fl.s.2024.0047

我们如今倡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为中式现代化服务。那么，外国文学研究又能怎样服务于中式现代化呢？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家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了对策，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要实现中式现代化，就要避免西方走过的弯路，也就是要考察由西方文学家们率先察觉的一些重大问题，或者说要做到知彼知己。就像 19 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曾经所说的那样，“知彼才能知己，知己才能改错，才能获得拯救”（Stone 2）。阿诺德说这番话，针对的是英国高速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两极分化、生态恶化、单向度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脱节），等等。阿诺德指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如何在赶超英美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又避免它们走过的弯路呢？这一问题迫在眉睫，要求我们对别国知根知底，而外国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有其特殊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家们往往能够比其他人更早、更敏锐地捕捉到有关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以 19 世纪英国为例，优秀小说家们率先发现并清晰地表达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那种“尚未进入史书的、压迫在人们心头的复杂体验”（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13）。如何把这种“复杂体验”转化为知识，这是西方学者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就此曾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说。他认为，人类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概括往往趋于简单化，以致现成的、被学术权威一锤定音的表述和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一回事儿，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切身体会则是另一回事儿。那种简单的概括，即便把所有经过清晰表述的、并且由各种制度或体制支撑的思想加在一起，也不能构成社会意识的全部，这是因为“只有它们及其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积极地体验过之后，它们才能够成为社会意识”（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30）。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尤其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得不到清楚的鉴定、分类和理性化的表述，或者说人们还来不及对它们加以系统而清晰的表述，社会高速转型的时期尤其如此。处于变动状态中的社会意识或社会体验往往未能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等领域中的现成总结 / 知识框架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转化为知识），或者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有鉴于此，威廉斯采取了“情感结构”这一新的说法，以便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威氏看来，“情感结构可以被界定为流动中的社会体验”（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33）。那么，如何把这种体验转化为知识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追问：这种流动中的社会体验能不能转化为知识呢？

在某些人看来，上述社会体验是不可能转化为知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文中这样说道：“何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郁建新、黄飙 15）。言下之意，未被科学验证过的知识称不上知识。按此逻辑推理，上述社会体验是未被验证的，或无法验证的，因此根本就不是知识，或者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一观点对吗？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有关思想。伽达默尔区分了两类知识，一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知识，另一类则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才能体验到的知识，后者像前者一样，也是一种真理。用伽达默尔的原话说，这后一种知识/真理的汲取须依赖特殊的方法，它“主要关注的不是如何积累已被验证过的知识，不是如何实现科学的方法论理想，但是它也关乎知识，关乎真理”（Gadamer xx）。伽达默尔的观点，显然比那种简单倚赖“被验证过的知识”（verified knowledge）的观点更为中肯。虽然伽氏所说的第二类知识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得到验证，而是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才能体验，但是它和科学知识同样重要。如果我们把真理比作一枚硬币，那么科学知识只是它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文学/艺术知识。缺失了这另一面，前文所说的“情感结构”/“流动中的社会体验”就会流失于知识系统之外。对于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我们来说，必须重视文学艺术才能抵达的情感结构，否则很可能重蹈西式现代化的覆辙。行文至此，我们其实已经暗示了本文第三段中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即流动中的社会体验是能够转化为知识的。

那么，上述体验怎样才能转化为知识呢？以笔者愚见，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重视文学艺术为我们带来的“共情”，二是要着眼于隐喻系统的构建。

先说“共情”，即英语中的 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的 sensus communis（常被译为“共通感”）。共情也是一种知识，但常常被忽视，或被排除在知识范畴之外。在此，伽达默尔的相关思想也可以借鉴。他反对把所谓“科学真理”作为唯一准则，为此他从维柯和沙夫茨伯里那里汲取灵感。维柯和沙夫茨伯里认为理性的证明和教导不能完全穷尽知识的范围，因此他俩都诉诸共情，后者其实是古代智慧概念里已有的要素。到了现当代，由于理性知识被不断拔高，以感性知识为基本特征的共情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事实上，共情是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知识，是一种另类知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实践知识（phronesis）。用伽达默尔的原话说，“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样性”（Gadamer 19）。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有必要在伽达默尔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即在尊重科学知识的同时，充分重视文学艺术体验所提供的知识，使其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鉴于文学艺术体验的基础是上述“流动中的社会体验”，我们建构的知识体系理应是开放式的，或者说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修正的。

再说隐喻系统的构建。任何知识系统的建构，都离不开隐喻的妙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隐喻性言说（metaphorical speech）看作高智力的标志（a sign of high intelligence）。据此推理，没有隐喻的言说是缺乏智力的表现，而缺乏了智力，知识系统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在此，乔治·爱略特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段“古今对话”可资借鉴。爱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一书中发问：“啊！亚里士多德！假如您有幸成为‘最新式的现代人’，而不是最伟大的古人，您是否会既赞扬隐喻性言说为高智力的标志，又哀叹世人言说中鲜有隐喻？您是否会哀叹我们很少能把一样东西说清楚，除非我们把它说成另一样东西？”（Eliot 129-130）此处，“说成另一样东西”就是运用隐喻。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需要运用隐喻。在

这方面，西方优秀文学家们巧用隐喻来质疑西方现代化主流话语 / 知识的一些事例不无启示意。例如，19 世纪英国的主流话语常把现代化进程形容为一往无前的“车轮”，而一些有识之士（包括阿诺德）则用“潮汐”意象对其挑战，这实际上意味着维多利亚思想史上的一次范式转换——隐喻转换意味着思想范式的转换（殷企平 107—112）。“车轮”隐喻是一种“直线”思维范式，即把现代化简单地视为社会财富的无限增长，一种直线式“进步”，而“潮汐”隐喻则警示现代化浪潮中的暗礁与险滩。如何应对这些暗礁与险滩？西方现代化强国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建构与之匹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这又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是否能提出比“潮汐”这类意象更高明的隐喻，以确保既警示暗礁与险滩，又昭示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在前行道路上，中国需要许多这样的隐喻性知识，并形成一個流动的开放式系统，一个不断接受社会 / 文化实践检验的知识系统。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文学艺术为我们带来的共情，也离不开隐喻系统的营造，而这又离不开外国文学的研究。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Eliot, George. *The Mill on the Floss*. Everyman's Library, 1908.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ranslated by W. Glen-Doepel, Continuum, 1975.
- Stone, Donal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 The U of Michigan P, 1997.
- Williams, Raymond.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Chatto and Windus, 1973.
-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P, 1977.
-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
- [Yin, Qiping.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 郁建新、黄飙：《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第 3 期，2023 年 6 月，第 14—24 页。
- [Yu, Jianxing, and Huang Biao.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no. 3, June 2023, pp. 14-24.]

责任编辑：王树福